

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

王 杰

摘要: 职业代际流动率上升与生育率下降是当代中国社会与人口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2023年的数据,使用逆向倾向值加权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职业代际流动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并从宏观层面考察绝对代际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身于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的代际向上流动会降低其生育数量,且向上流动到专业管理阶层对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男性。职业代际向下流动仅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数量,且主要体现在代际向下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的个体之中。中国大规模出身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代际向上流动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缓解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张力,是破解社会流动率上升和生育率提升之间两难困境的关键。

关键词: 职业代际流动; 生育行为; 性别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5.020

一、引言

随着总和生育率降至1左右,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①,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养育成本攀升和生育动机转变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②。就个体层次而言,生育行为除受个体当下社会经济处境影响外,也会受到既往生活经历的持续影响。其中,代际流动即子代相较于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变迁,可能是影响个体生育行为最为重要的生命历程经历^③。现阶段我国社会职业结构持续优化,绝对代际向上流动比例稳步提升^④,且女性群体的向上流动趋势更为显著^⑤。在此社会变迁背景下,系统考察不同职业代际流动模式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辨析其性别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研究意义。

学界围绕社会流动与生育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理论阐释,但既有的实证研究并未全面观测到职业代际流动经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相关经验证据仍存在争议^⑥。其原因在于,此类研究将流动效应界定为剥离父代初始背景与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之后,流动经历产生的增量影响,即“相对流动影响”。但无论是从古典社会学有关社会流动的经典理论出发,还是从社会流动产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24CSH066)。

作者简介: 王杰,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社会学院)副教授(苏州 215123; wangjie1110@suda.edu.cn)。

① 穆光宗、侯梦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考与探讨》,《人口与发展》2025年第5期。

② 李萌萌、王振宇、高志鹏:《婴幼儿养育成本、“幼有所育”与人口出生率》,《人口与发展》2023年第6期;宋健、胡波:《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6期。

③ Gan Y., Wang P., “Social Clas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3, 114, No. 102912.

④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⑤ 李煜、左静怡:《中国女性的代际流动(1992—2021):特征与城乡差异》,《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⑥ Sobel M. E.,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Some New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5, 50(5), pp. 699-712; Gan Y., Wang P., “Social Clas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3, 114, No. 102912.

的整体性社会后果加以审视,个体流动所带来的当期地位提升本身是流动过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应当被纳入流动效应的考察范畴,即应从绝对流动视角考察二者间的关联。而且,从宏观社会研究的现实关切来看,若要解释大规模社会流动对整体生育率的结构性影响,相较于剔除地位禀赋的相对流动效应,包含地位变迁收益的绝对流动效应更具解释力与现实意义。为了突破传统相对流动分析的方法局限,布林与艾瑞密斯构建了适配社会流动后果研究的因果推断分析框架^①,为精准识别绝对流动的净效应提供了规范的实证范式,但目前该分析框架尚未被应用于代际流动与生育行为关联的研究中,相关方法应用仍存在明显空白。

结合中国本土语境,近十余年来生育政策持续放宽,制度对个体生育行为的约束逐步弱化,代际流动等生命历程特质因素对生育决策的解释力持续凸显。但综观国内现有研究,不仅缺乏对职业代际流动影响生育行为的系统性检验,而且对其潜在性别异质性探讨不足,同时也鲜有研究聚焦代际流动对整体生育水平的结构性作用,难以回应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生育变迁现实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因果分析的框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从微观层面,在纳入当前阶层的影响后,不同职业代际流动类型对个体生育行为是否有影响?二是若有影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三是从宏观层面,大规模的职业代际向上流动是不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既能检验不同社会流动理论对中国生育现象的解释力,有利于补充和完善社会流动理论,又能为基于代际流动模式的生育水平提升提供对策建议,有助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争议

1890年,杜蒙特提出经典的社会毛细血管学说,系统阐释了社会地位变迁与家庭生育选择的内在关联,为理解社会流动影响生育行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经典理论依据^②。该理论主张,正如液体借助毛细血管向上流动时需收缩管径,家庭和个体也需要主动调整生育策略以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跨代跃升,即为了减轻自身向上流动的额外负担,个体会倾向于少生孩子。该理论虽侧重主观向上流动的影响,但其逻辑亦可用于解释客观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从这一视角分析代际向下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其一,向下流动的个体为重新获得失去的社会地位或避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可能主动限制生育^③;其二,如果向下流动者没有提高自己地位或维持原有地位的欲望,则会将更多资源用于生育和抚养子女上,故代际向下流动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影响^④。

工作-家庭视角下的生育研究部分延续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毛细血管学说的核心分析逻辑,纳入性别差异视角,完善了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影响生育行为的理论体系^⑤。工作-家庭冲突理论从职业发展角度阐释了个体地位提升对生育决策的抑制作用,且这一约束效应在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持续提升,双薪家庭逐步成为社会主流形态,妻子的职业发展与经济收入对家庭生育安排的约束作用持续增强^⑥。但相较于教育、就业等公共领域

① Breen R., Ermisch J.,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Science*, 2024, 11, pp. 467-488.

② Westoff C. F., "The Changing Focus of Differential Fertility Research: The Social Mobility Hypothesis",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53, 31(1), pp. 24-38.

③ Boyd M.,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in Metropolitan Latin America", *Demography*, 1973, 10(1), pp. 1-17.

④ Kasarda J. D., Billy J. O. G.,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5, 11, pp. 305-328.

⑤ 杨菊华:《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⑥ Oppenheimer V. K.,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Gain to Marriage: 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Mode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 23, pp. 431-453.

快速推进的性别平等,私人领域的性别分工变革相对滞后。女性在职业晋升与家庭照料的双重压力下,生育机会成本大幅提升,这也成为欧美各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重要诱因^①。

流动离析论与文化融入论则从社会学视角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流动的生育效应机制,厘清了不同流动状态影响生育行为的内在路径。流动离析论强调,任何职业类型变迁或社会经济地位变化,都需要个体付出时间和精力以融入新的社会情境,而长期的适应压力会加剧个体精神与心理负荷,形成持续性的心理耗损,进而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②。文化融入论则从社会融合与身份认同视角阐释流动的生育后果,强调代际流动引发的身份转换与人际环境变动,会造成个体的社会融入困境,进而重塑其行为偏好与生育决策^③。代际流动群体普遍面临双向融入困境——他们既难以完全适配流入圈层的行为规范与社交模式,又会逐步脱离原本圈层,极易产生身份割裂感与不安全感。这种心理状态不仅会通过身心压力抑制个体生育行为,还会弱化其养育孩子的主观意愿。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流动方向的异质性影响:代际向上流动者虽无法完全融入新的社会圈层,但职业与地位的跃升能够使其在原生圈层中获得认可与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导致的身份焦虑;而代际向下流动者既难以适应向下流动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又会在与原生圈层的持续对比中产生挫败感与失落感。因此,相较于代际向上流动,代际向下流动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强烈。

与上述社会学理论的分析逻辑不同,相对经济地位论从经济学视角构建了差异化的解释框架,形成了与社会毛细血管学说截然不同的理论预判^④。该理论指出,家庭生育决策取决于个体经济资源与消费偏好的匹配程度:当家庭收入水平与个体消费偏好相匹配时,剩余资源会促使生育数量增加;反之,当经济资源难以满足消费期待时,生育行为则会受到明显抑制。依据这一逻辑,代际向上流动能够显著提升个体当期社会经济水平,使其收入条件超越早年社会化阶段形成的低消费预期,从而对其生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代际向下流动会造成经济收入减少,其拥有的资源无法匹配已经形成的消费偏好,从而对其生育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二)经验发现

依托上述多元理论框架,学界围绕职业代际流动与个体生育行为的关联展开了丰富的实证检验,但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相关经验证据存在明显分歧。部分研究证实,职业代际向上流动会显著抑制生育行为^⑤。另有研究基于相对流动分析思路发现,在剥离父代背景与个体当期社会经济禀赋的干扰后,向上与向下的代际流动对生育数量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⑥。还有实证结果表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生育行为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而向下流动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⑦。部分跨国比较研究指出,代际流动的生育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该效应会随时代变迁与国别社会制度差异产生动态波动^⑧。更为普遍的研究结论认为,向上与向下的职业代际流动对个体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均无

① Esping-Andersen G., Billari F. C.,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41(1), pp. 1-31.

② Sorokin P. A., *Social and Culture Mobil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p. 510.

③ Blau P. M.,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3), pp. 290-295; Kasarda J. D., Billy J. O. G.,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5, 11, pp. 305-328.

④ Easterlin R. A., “The Conflict between Aspirations and Resour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6, 2(3/4), pp. 417-425.

⑤ Berent J., “Ferti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1952, 5(3), pp. 244-260; Hope K.,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1, 36(6), pp. 1019-1032.

⑥ Blau P. M., 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Free Press, 1967, pp. 382-399.

⑦ Brea-Martinez G., Dribe M.,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Applying Diagonal Reference Models in Historical Studies”, *Historical Methods*, 2025, 58(2), pp. 111-122.

⑧ Billingsley S., Matysiak A., “Social Mobility and Family Expansion in Poland and Russia during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018, 36, pp. 80-91.

显著影响^①,其原因在于多数研究沿用相对流动范式,将流动效应界定为控制出身背景与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后流动经历所产生的纯粹增量影响。

事实上,无论是基于理论主张还是现实研究关切,社会流动效应的完整测算都应当纳入个体流动后的当期社会经济禀赋,即聚焦绝对流动效应展开分析。从经典理论来看,社会毛细血管学说指出个体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跃升所付出的时间、经济与精力成本,会形成生育约束,直接体现为地位变迁带来的生育效应。流动离析论也暗含绝对流动的分析逻辑,其核心范式是将流动者与“未发生流动、留存于原生发展状态”的反事实自我进行纵向比对,而非与当前圈层内的其他个体横向对照^②。文化融入论同样强调,流动个体的生育行为的确会直接受到流入圈层生育观念、行为模式的浸润与塑造,但生育转变的实现,本质依托的是流动后的现实地位与生存环境。此外,相对经济地位论也着重凸显了流动后当期经济资源禀赋对生育决策的正向激励作用。由此可见,主流社会流动理论的核心分析逻辑均立足于个体纵向自我对比,通过比较“发生代际流动”与“维持原生发展状态”的行为差异识别真实流动效应^③,这与绝对流动的分析范式高度契合。

基于此,本文立足中国本土社会流动与生育发展现实,跳出传统相对流动的分析局限,聚焦职业代际流动的绝对流动效应,结合既有理论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系统检验其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效果。

(三)研究假设

职业发展与生育行为的互动关系,为阐释职业代际流动影响生育决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研究启示。现有研究多聚焦生育对个体职业发展的反向制约效应,普遍认为生育行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向冲击远大于对男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生育不仅会显著加剧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④,还会破坏其职业发展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持续性职业损耗,最终抑制女性的就业参与与职业晋升进程^⑤。当职业发展目标与生育需求形成冲突时,具备向上流动意愿、追求职业地位提升的女性,往往会通过延迟生育、减少生育数量甚至放弃生育的方式保障职业发展空间^⑥,这一作用逻辑与社会毛细血管学说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

从绝对流动的分析范式来看,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由两层机制构成:一是流动后当期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直接影响,二是代际流动经历本身产生的额外增量影响。梳理国内外既有研究可以发现,父代出身背景与个体当期社会经济禀赋对生育行为具有稳定的解释效力,而流动经历本身的独立作用往往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代际流动者的当期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其生育行为的核心因素。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前文经典理论的支撑:社会毛细血管学说从地位获得过程维度,揭示了流动后当期地位特征对生育选择的约束作用;文化融入论与相对经济地位论则进一步补充,流动个体所处圈层的经济资源禀赋、主流生育观念与行为范式,均会深刻影响其生育决策。

从经济资源机制来看,家庭生育决策遵循子女需求的成本-收益逻辑,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关系是影响家庭生育选择的核心因素^⑦。在养育成本持续攀升的社会背景下,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并

① Boyd M.,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in Metropolitan Latin America", *Demography*, 1973, 10(1), pp. 1-17; Sobel M. E.,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Some New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5, 50(5), pp. 699-712; Gan Y., Wang P., "Social Clas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3, 114, No. 102912.

② Sorokin P. A., *Social and Culture Mobility*, pp. 509-510.

③ Breen R., Ermisch J.,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Science*, 2024, 11, pp. 467-488.

④ 茅彦卓、姬思敏、万琳琳:《生育对育龄职工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视角》,《人口学刊》2025年第5期。

⑤ 王鹏、吴愈晓:《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⑥ 付正鑫、杨小军、康传坤:《升职还是生子——职业发展对女性生育的影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10期。

⑦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3-112.

不会简单带来生育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推动家庭生育偏好由“数量优先”转向“质量优先”。伴随我国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家庭教育投入持续加码,重视子代教育质量、精细化养育的育儿理念成为社会主流^①。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凭借更充裕的经济资源,具备更强的子代质量培育能力,因此更倾向于缩减生育数量、集中资源提升子女发展质量;反之,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对子代数量的偏好相对更强。据此可以推断,职业代际向上流动能够通过提升个体当期社会经济水平抑制生育行为,而职业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弱化这一约束效应。

从生育观念机制来看,不同社会经济圈层具有差异化的生育价值取向。高社会地位群体普遍秉持自我实现导向的个体主义生育观念,传统“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家庭主义生育认知持续弱化。个体主义生育观更强调个人生活质量与自我发展,倾向于晚婚晚育、降低生育规模,进而形成更低的生育水平^②。而低社会地位群体的生育观念更偏向传统家庭主义,对多子代数量的接纳度更高,进一步强化了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2:职业代际向下流动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与此同时,职业代际流动的生育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异质性,这一差异根植于我国公私领域性别平等的非均衡发展^③。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市场劳动领域存在显著的性别歧视与职业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距持续存在;而在家庭私人领域中,传统父权文化固化了性别分工模式,女性依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劳动与家庭照料责任^④。公私领域的双重性别压力导致女性面临更严峻的工作-家庭冲突,大幅抬高了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因此想要实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女性有可能遭遇更剧烈的生育与职业发展冲突,使其更倾向于压缩生育规模;而发生职业代际向下流动的女性,职业发展压力与生育机会成本显著降低,同时更易受到低阶层传统家庭主义生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意愿相对更高。相较于女性,男性受家庭照料、生育机会成本的约束更弱,且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其生育决策更多受到家庭经济压力的制约,代际流动对其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相对有限。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3:相较于男性,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女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

假设4:相较于男性,职业代际向下流动对女性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

从宏观社会变迁视角来看,大规模人口职业结构转型与代际向上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最鲜明的特征。伴随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劳动力职业结构实现了明显转型,传统农业劳动者大规模向非农职业转移,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率大幅提升,总流动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攀升至21世纪初的0.71^⑤。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劳动者占比由1982年的72%降至2015年的36%,而销售服务人员、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等非农职业占比大幅增长^⑥,出身农业家庭的个体跨阶层向上流动成为我国职业代际流动的主导类型。微观个体的生育行为变迁最终汇聚为宏观生育率变动,大规模基层群体的向上流动及其伴随的生育偏好转变,是解读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关键宏观动因。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5: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个体发生大规模职业代际向上流动,是推动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重要诱因。

① 杨可:《母职的经纪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② 陈滔、胡安宁:《个体主义还是家庭主义?——不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④ 许琪:《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述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⑤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⑥ Gan Y., Wang P., “Social Clas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3, 114, No. 102912.

三、数据、变量与统计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2023年的数据[以下简称CGSS(2017—2023年)]。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剔除未婚、同居、离婚、丧偶及再婚者。(2)个体在30岁后达到职业成熟期,即职业阶层地位很少发生变动,且1964年及以后出生的被访者,其14岁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处于相同的社会情境中^①。故剔除受访时年龄小于30岁或出生年份早于1964年的被访者,处理后的样本年龄为30—59岁^②。(3)剔除被访者一直未工作和被访者14岁时父亲和母亲均没有工作(离退休、无业等)的样本。(4)剔除研究所使用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样本量为12324个。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为生育数量。基于“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包括已去世子女)?”这一问题获得因变量,将儿子数和女儿数加总获得实际生育子女数^③,并对生育子女数变量在1%和99%分位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自变量为职业代际流动,即出身职业阶层与当前职业阶层的关系。出身职业阶层由14岁时父亲或母亲中职业地位更高的一方进行测量,当前职业阶层由被访者当前或最近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进行测量。将国际标准职业编码(ISCO-08)转化为EGP职业分类,共11类^④。随后将11个职业分类压缩为4个等级的社会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I和II),称之为专业管理阶层;普通办事人员、个体经营者、蓝领班组长(IIIa、IIIb、IVa、IVb和V),称之为中等阶层;体力工人阶层(VI和VIIa);农业劳动者阶层(VIIb和IVc)。4类划分有以下好处:一是便于划分职业代际流动的方向^⑤;二是4类划分首先借鉴了就业关系理论,将拥有大致相似的市场处境和工作处境(如权威关系、收入水平等)的职业归为一类,划分为专业管理阶层、中等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⑥。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户籍制度放松,使大量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个体得以流动到工人阶层,进一步将体力劳动者阶层划分为体力工人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三是4类划分也能增加不同代际流动类型的样本量,从而增强估计值的可靠性。将出身阶层与当前阶层相同界定为职业代际未流动,出身阶层低于当前阶层界定为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出身阶层高于当前阶层界定为职业代际向下流动。

将可能影响生育行为和职业代际流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与女性)、年龄、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14岁时的户口(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初

① 蔡韦成、谢宇:《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社会》2024年第1期。

② 将年龄下限上调至35岁,或依据调查年份筛选出调查时年龄为30—59岁的样本,两者的分析结果与当前结果基本一致。同时,考虑到分析样本在生育历程中生育政策变化较大,更年轻已婚夫妻的生育行为更少受原有生育政策的限制,故分析了调查时年龄为20—49岁(育龄女性的年龄段)的样本(年龄平均值38.67),间接检验原有生育政策对分析结果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与当前结果基本一致。

③ CGSS问卷调查同时询问了“请问您有几个(亲生)子女(包括已去世子女)”。但从抚育角度出发,继子女、养子女与亲生子女都是家庭抚养成员,都需要家庭投入养育资源(包括经济投入与时间精力),其数量变动同样受职业代际流动引致的家庭资源变化的影响,故最后三类子女均被纳入分析样本之中。从数据来看,样本中含有继子女、养子女的家庭占比很小(约1%),对只有亲生子女的样本进行模型估计的结果并未发生改变。

④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Portocarero L.,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30(4), pp. 415-441.

⑤ 李姚军、王杰:《社会流动与传统性别意识——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

⑥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35-47.

中、小学及以下)、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出生年份(1964—1973年、1974—1983年和1984—1993年)、调查年份(以2021年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为节点,分为2017—2018年和2021—2023年)。

(三)统计方法

因果分析法采用反事实分析思路,使用条件平均干预效应(ATT)分析流动效应^①。具体来说,通过比较出身阶层 j 、代际流动到阶层 k 的被访者的实际生育数量与如果未发生代际流动(反事实)的生育数量潜在结果的差异,估计流动效应。

$$\begin{aligned} \text{ATT} &= E[Y_i(k) - Y_i(j) | O=j, D=k] \\ &= E[Y_i(D=k) | O=j, D=k] - E[Y_i(D=j) | O=j, D=k] \end{aligned} \quad (1)$$

式(1)中, O 表示出身阶层,取值为 j , D 表示当前阶层,取值为 k , $Y_i(k)$ 表示被访者 i 出身阶层为 j 流动到 k 阶层的潜在结果, $Y_i(j)$ 为被访者 i 未发生代际流动的潜在结果。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样本而言,我们只能观察到 $Y_i(k)$ 或 $Y_i(j)$ 其中的一种结果,故无法获得个体层面的流动效应。然而,我们可以估计总体中流动群体与未流动群体平均结果的差异获得平均流动效应,如式(1)第二行所示。首先使用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MLogit)分析出身于特定阶层流动到其他阶层的影响因素^②。随后,采用逆向倾向值加权的泊松回归来估计不同代际流动类型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从而检验假设1和假设2。

然而,逆向倾向值加权的泊松回归估计不同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和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如受访者的兄弟姐妹数,不仅通过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从而对个体的职业流动产生影响,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生育行为。此外,生育行为与职业代际流动可能存在双向因果。为此,使用工具变量泊松回归(IV-Poisson)对结果做稳健性检验。借鉴相关研究,使用区/县层面上向上流动的密度^③,即以样本所在区/县发生向上流动的人数与区/县的样本总人数之比构造工具变量。

为检验假设3和4,分性别进行回归分析后,通过Z统计值检验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影响的性别差异^④,见式(2)。 $\hat{\beta}_f, \hat{\beta}_m$ 分别为女性和男性样本估计的代际流动影响系数, $s^2(\hat{\beta}_f), s^2(\hat{\beta}_m)$ 分别为 $\hat{\beta}_f$ 和 $\hat{\beta}_m$ 标准误的平方。

$$Z = (\hat{\beta}_f - \hat{\beta}_m) / \left[s^2(\hat{\beta}_f) + s^2(\hat{\beta}_m) \right]^{1/2} \quad (2)$$

为检验假设5,通过观察到的生育率与未发生代际流动生育率的差异进行检验,分析职业代际绝对流动率(流动个体的占比)对生育率的影响,公式如下所示:

$$E(Y) - \sum_j E(Y_{jj}) p_j \quad (3)$$

式(3)中, $E(Y)$ 表示观察到的生育率, $\sum_j E(Y_{jj}) p_j$ 表示代际职业流动表格中未流动单元格生育率的加权之和。权重(p_j)是特定出身阶层所占比例。假定总体结果是个体效应的简单叠加,式(3)能够转化为不同代际流动类型效应的加权之和($\sum_{i \neq j} \varphi_{ij} p_{ij}$)^⑤。汇总数据的标准误由加权流动效应之和的方差开方所得,其中各类流动效应的方差为其标准误的平方。

① Breen R., Ermisch J.,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Science*, 2024, 11, pp. 467-488.

② 受篇幅所限,结果未在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 Yang X., Wen Q., Ma J., et al., “Upward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0, pp. 1-13.

④ Clogg C. C., Petkova E., Haritou A.,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100(5), pp. 1261-1293.

⑤ Breen R., Ermisch J.,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Science*, 2024, 11, pp. 467-488.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女性(55.97%)占比高于男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59个。父辈中66.65%为农业劳动者阶层,体力工人阶层、中等阶层、专业管理阶层的占比分别为12.28%、9.39%、11.68%。与父辈相比,子代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占比少39.22个百分点,而子代为体力工人阶层、中等阶层、专业管理阶层的占比分别高15.32个、19.71个、4.19个百分点。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占比为51.8%,远超代际向下流动的比例(11.13%),37.07%的被访者与父辈社会阶层相同。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样本量12324)

变量	百分比	均值/标准差	变量	百分比	均值/标准差
生育行为	—	1.59/0.74	职业代际流动		
父辈职业地位			未流动	37.07	—
专业管理阶层	11.68	—	向上流动	51.80	—
中等阶层	9.39	—	向下流动	11.13	—
体力工人阶层	12.28	—	父母受教育程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	66.65	—	高中及以上	16.63	—
子代职业地位			初中	20.07	—
专业管理阶层	15.87	—	小学及以下	63.30	—
中等阶层	29.10	—	区域		
体力工人阶层	27.60	—	东部	37.11	—
农业劳动者阶层	27.43	—	东北	26.38	—
性别			中部	26.92	—
男性	44.03	—	西部	9.58	—
女性	55.97	—	出生年份		
民族			1964—1973年	48.03	—
汉族	91.64	—	1974—1983年	34.57	—
少数民族	8.36	—	1984—1993年	17.41	—
14岁时户口			调查年份		
农业户口	76.22	—	2017—2018年	64.68	—
非农户口	23.78	—	2021—2023年	35.32	—
年龄	—	43.97/7.65	向上流动的密度		0.43/0.14

2. 职业代际流动与生育数量^①。从出身阶层看,在社会阶层为中等阶层及以下的群体中,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少,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相比,中等阶层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少0.4个,但和出身于中等阶层人员相比,出身于专业管理阶层的群体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多0.06个。从当前阶层来看,当前阶层地位越高,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少。从代际未流动者看,代际稳定于农业劳动者阶层、体力工人阶层、中等阶层、专业管理阶层的群体,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分别为1.88个、1.40个、1.26个、1.21个。而代际向下流动也会增加其生育数量,且跨越的阶层等级越多,对生育的正向影响越强,如:出身于专业管理阶层向下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个体,比代际稳定于专业管理阶层的个体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多0.26个。从代际向上流动看,代际向上流动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且跨越的阶层等级越多,对生育的负向影响越强。

(二)多元统计分析

1. 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分析。表2表明泊松回归与逆向倾向值加权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但工具变量的分析结果与前两者的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出身阶层为专业管理阶层和中等阶层的样本。因工具变量法考虑了遗漏变量偏差与双向因果的问题,若不存在弱工具

① 因篇幅限制,详细数据结果留存备索。

变量问题,将依据工具变量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否则依据逆向倾向值加权的结果进行分析。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判断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①。表2第4列中仅加粗单元格流动效应的分析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F统计量大于10)。接下来,将依据表2中加粗单元格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出身于专业管理阶层仅向下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anel A)。对出身于中等阶层的流动者而言,仅向下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对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anel B)。对出身于体力工人阶层的流动者而言,仅向下流动到农业劳动者阶层对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向上流动无显著影响(Panel C)。然而,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无论向上流动到哪一个阶层均对生育数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尤其是长距离流动到专业管理阶层负向影响最强(Panel D)。

表2 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

职业代际流动	泊松回归 (Poisson)	倾向值加权法 (IPW)	工具变量法 (IV-Poisson)
Panel A. 出身专业管理阶层的流动			
从专业流动到中等	0.023(0.030)	0.023(0.030)	0.023(0.856)
从专业流动到工人	0.075 ^{**} (0.036)	0.078^{**}(0.036)	1.369(3.389)
从专业流动到农民	0.197 ^{***} (0.053)	0.188 ^{***} (0.051)	0.206(0.179)
Panel B. 出身中等阶层的流动			
从中等流动到专业	0.004(0.034)	0.002(0.034)	0.244(0.294)
从中等流动到工人	0.078 ^{**} (0.036)	0.101[*](0.053)	-4.550(24.997)
从中等流动到农民	0.120 [*] (0.063)	0.276 ^{***} (0.054)	-0.079(0.167)
Panel C. 出身体力工人阶层的流动			
从工人流动到专业	-0.044(0.033)	-0.037(0.033)	-0.012(0.463)
从工人流动到中等	-0.021(0.028)	-0.024(0.028)	-0.283(0.257)
从工人流动到农民	0.218 ^{***} (0.048)	0.134 ^{**} (0.059)	0.349[*](0.194)
Panel D. 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动			
从农民流动到专业	-0.207 ^{***} (0.019)	-0.195 ^{***} (0.022)	-0.448^{***}(0.104)
从农民流动到中等	-0.107 ^{***} (0.014)	-0.095 ^{***} (0.015)	-0.218^{***}(0.044)
从农民流动到工人	-0.100 ^{***} (0.013)	-0.103 ^{***} (0.013)	-0.255^{***}(0.046)

注:(1)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年龄、14岁时的户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出生年份、区域和调查年份。(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3)^{*} $P<0.1$,^{**} $P<0.05$,^{***} $P<0.01$ 。(4)第4列中加粗数据为使用二阶段估计法时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中F值大于10,未加粗数据为F值小于等于10。

综上,农业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体力工人或中等阶层向上流动对生育行为无显著影响,假设1获得部分支持。上述不同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类型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差异可能由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在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与出身体力工人阶层或中等阶层相比,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要付出更多时间、金钱和精力,挤占了生育孩子的相应资源,从而对生育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往往伴随着地理空间上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受城市相对高昂的生育成本的影响,也对生育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职业代际向下流动对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入到体力工人阶层群体中,假设2获得部分支持。在中国,父辈从事非农工作,而子代从事农业劳动较少发生(样本量为343),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考虑遗漏变量偏差的影响后,向下流动到农业劳动者阶层对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变得不显著或显著性水平降低。专业管理阶层与中等阶层间的流动是常见的职业代际流动类型,这两个相邻阶层间的亲和性可能是导致专业管理阶层与中等阶层间的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未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

① 陈云松、许琪:《社会科学中因果推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48—249页。

2. 性别差异分析。表3仅展示不同职业代际流动类型对男性或女性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分析结果。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行为普遍具有抑制效应。当向上流动至专业管理阶层时,女性所受的生育抑制显著强于男性($-1.688, P<0.1$),而当向上流动至体力工人阶层或中等阶层时,性别差异则不再显著(系数分别为 -1.637 、 -0.998 , P 值均大于 0.1)。假设3获得部分支持。该结果可归因于两个层面:其一,相较于代际向上流动至中等阶层或体力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至专业管理阶层的个体所面临的生育机会成本更高;其二,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性别平等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女性相较于男性在向上流动至专业管理阶层时需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故向上流动对女性生育行为产生更为显著的抑制效应。对向下流动者而言,无论是专业管理阶层或中等阶层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还是从体力工人阶层流动到农业劳动者阶层,均对男性的生育行为无显著影响,却显著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水平。假设4获得部分支持。代际向下流动对男性生育行为未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向下流动导致经济资源缩减会加重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养家压力,进而对生育产生抑制作用,从而抵消了较低阶层传统家庭主义生育观可能带来的正向生育效应。

表3 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

职业代际流动	男性	女性
向上流动		
从农民流动到专业	$-0.276^{**}(0.132)$	$-0.650^{***}(0.178)$
从农民流动到中等	$-0.163^{**}(0.074)$	$-0.255^{***}(0.055)$
从农民流动到工人	$-0.179^{***}(0.061)$	$-0.331^{***}(0.070)$
向下流动		
从专业流动到工人	$0.075(0.049)$	$0.114^{**}(0.052)$
从中等流动到工人	$0.104(0.081)$	$0.148^{**}(0.069)$
从工人流动到农民	$-0.042(0.369)$	$0.570^{**}(0.251)$

注:控制变量包括民族、年龄、14岁时的户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出生年份、区域和调查年份。

3. 宏观社会流动效应分析。表4结果表明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向下流动对生育率具有正向影响($0.005, P<0.1$),而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对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0.114, P<0.01$)。出身中等阶层和体力工人阶层,无论向上还是向下均对生育率无显著影响。整体上看,代际向上流动的负向影响远大于代际向下流动的正向影响,因此总的代际流动降低了生育率($-0.111, P<0.01$),这表明: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大规模职业代际向上流动,是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重要诱因,假设5得到验证。

表4 职业代际绝对流动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分析

出身阶层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汇总
专业管理阶层		$0.005^{*}(0.003)$	
中等阶层	$0.007(0.008)$	$0.001(0.001)$	
体力工人阶层	$-0.014(0.012)$	$0.003(0.002)$	
农业劳动者阶层	$-0.114^{***}(0.013)$		
合计			$-0.111^{***}(0.020)$

注:控制变量同表2。

五、结论与启示

利用CGSS(2017—2023年)的数据,研究了职业代际流动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性别差异,并从宏观层面探究了绝对代际流动率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生育行为具有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到体力工人阶层、中等阶层和专业管理阶层中。第二,职业代际向下流动对生育行为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入体力工人阶层的个体中。第三,职业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到专业管理阶层对女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职业代际向下流动仅对女性生育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中国大量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是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流动离析论、文化融入论和相对经济地位论相比,研究结论更多支持了社会毛细血管学说。此外,将性别视角融入分析中,丰富了社会毛细血管学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社会毛细血管学说从地位获得过程视角表明了流动者的当前阶层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但忽视了流动者当前阶层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生育观念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这表明代际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宏观层面,既有研究指出,更高的相对流动率有助于提升夫妻的期望子女数^①。然而,职业代际流动率包括两个方面:相对流动率和绝对流动率,国外研究发现两者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方向相反^②。近十多年,尽管中国的相对流动率有所下降,但绝对流动率持续上升^③。从绝对流动率视角出发,研究发现绝对流动率持续上升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的分析充实了社会流动领域的既有研究,对丰富社会流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重要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若干启示。第一,生育支持政策需加强对出身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向上流动群体的支持力度,以提升政策实效。与较高阶层中的未流动者相比,从农业劳动者阶层向上流动至较高阶层者,由于受父辈家庭主义生育观念及多子女家庭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生育意愿。然而,向上流动通常伴随着职业竞争加剧、城市生活及养育成本上升,加之受流入阶层个体主义生育观念的渗透,多重因素交错叠加,抑制了该群体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可能性。为此,政策应着力缓解其职业上升期的生育机会成本:一方面,通过推动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以及落实育儿假等方式,帮助企业员工平衡职业发展与家庭照顾需求;另一方面,在育儿补贴、生育津贴、托育服务及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降低其城市生活与养育成本。同时,应开展新型生育文化宣传,在尊重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营造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助力该群体释放生育潜力。第二,向下流动至体力工人阶层对生育行为有正向影响,但这一群体经济脆弱性突出,生育数量较多可能进一步加剧家庭资源紧张。因此,政策需将生育支持与就业救助、技能再培训有机结合,防止该群体因生育而陷入发展困境。第三,社会流动率的上升是社会结构开放性增强的重要表征,而生育率的提升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然而,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应对这一双重挑战的关键,在于有效缓解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冲突。公私领域性别平等的不均衡发展是导致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难以平衡的关键所在。鉴于此,一方面,应通过完善立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及询问婚育信息等行为,创设女性友好的职场环境,以降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另一方面,需通过鼓励男性分担家务、重塑父职角色——即从单纯的经济供养者转向共同参与养育的实践者——来推动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切实减轻女性的双重负担。

① 蔡韦成、谢宇:《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社会》2024年第1期。

② Stevens G.,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Two Effects in O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 46(5), pp. 573-585.

③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Behavior —An Analysis Based on Causal Inference

Wang Ji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Red Cross (School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P. R.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decline in fertility rates are two defining features of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ginning in 1980, China implemented a strict one-child policy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hich constrained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behavior. Over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relax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in 2012 and 2014, followed by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2016 and the three-child policy in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behavi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alient.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where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actual fertility behavior, gender differences, and fertility rate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from 2017-2023, this study adopts a causal inference framework and applies inverse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on individual fertility behavior and the associated gender differences.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macro-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lut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ates and fertility rat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upwar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behavior, particularly among individuals who move upward from the agricultural laborer class to the manual worker class, the intermediate class, and the managerial-professional class. Second,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behavior, mainly among individuals who move into the manual worker class. Third, the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on fertility behavior differ by gender: compared with men, women experience a stronger negative effect when they move upward into the managerial-professional class, while down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ly on women's fertility behavior. Fourth, the large-scale upward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originating from the agricultural laborer cla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China's continued fertility declin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tronger support for the status-enhancement thesis. By incorporat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nriches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The findings also carry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Upwardly mobile individuals originating from the agricultural laborer class are both in urgent need of fertility policy support and a group with considerable potential to raise fertility levels. Fertility policies should therefore provide stronger support for this group. Since women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bearing, and because upwar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has a stronger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fertility behavior, easing the tension between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hildbearing is crucial to resolving the dilemma between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raising fertility rate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Fertility behavior; Gender

[责任编辑:王苏苏]